

《论语》与孔子的礼学思想

安普华

【摘要】礼是孔子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之上。在孔子看来,礼具有多样的社会功用;同时,孔子要求的礼的实行不仅应带有伦理情感,还应坚持“和”的原则。

【关键词】论语;礼仁;功用;论利;中和

【中图分类号】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93(2005)02-0037-02

一、礼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的精神

古礼与原始初民的衣食住行的风俗习惯和原始宗教相关,为的是满足原始初民生活中的物质生活需要。“礼…这个三代传留下来的东西,实际是夏、商、周三代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实际的社会生活。”所以,针对礼的这种传承性,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以下引用《论语》只注篇名)。在西周时代,礼不仅演变成了一套非常系统完备的制度,而且成为人们思想言行的准则和规范,用以来维护整个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奴隶贵族统治,又对奴隶贵族们提出三点要求:敬天、孝祖、保民,体现出理性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色彩,这正与孔子所提倡的“仁者爱人”的精神原则相契合。随着西周统治的终结,奴隶制统治的鼎盛时代已过去。到了孔子时代,诸侯之间相互征伐,大夫弑君僭礼的事件屡屡发生,整个社会呈现着“礼崩乐坏”的局面。因此,孔子对西周社会统治的井然有序表现出极强的向往之情,“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他的这种向往是对奴隶贵族统治辉煌时期的依恋,是对奴隶贵族统治鼎盛时期的追寻。他提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颜渊》),试图通过“复礼”来实现“仁”,来挽救日益没落的奴隶贵族统治的统治秩序。

但是孔子对于理想社会的追寻并没有片面地停留在抽象的玄思和空洞的说教上,而是实际地把他所向往与追求的理性社会和人道精神融入到日常现实生活、伦常情感和政治生活中。孔子说“人而不仁如何”(《八佾》),表明礼的实行必须有仁的精神作为支撑,否则礼就无从谈起。他又认为“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要求礼的贯彻实行要从自我做起,不断地克制自我的欲望,这样才能符合礼的标准,实行礼的精神,从而与孔子的一生奋斗追求的最高境界——“仁”的精神相切

合。那么,如何“克己”呢?孔子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他要求个人的一切行动都要以礼作为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同时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完成礼而达到仁。在和子夏讨论礼时,他又提出“绘事后素”(《八佾》),认为个人只有纯正的品质是不够的,还需要礼的规范和导引。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礼学思想同他的仁学思想之间直接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是从仁学出发理解、彻悟、贯彻、实现仁的精神的方式和途径。这使得他的礼学观更加理性化,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更具有吸引力。

二、礼的社会功用

孔子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周游列国,虽然屡屡碰壁,却始终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现实世界。他曾自我评价:“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曾子也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这可以看作是对孔子一生的评论。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具有强烈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功用性。而他的礼学思想,作为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功用性。

其一,孔子认为礼是个人修身立命的首要条件。礼包含着仪器、礼器、服饰等的安排以及左右周旋,进退俯仰等一套琐细而又严格的规定,孔子把它列为“六艺”之最尊位,是强调他在对个人品德情操修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作为“艺”礼的规定的学习和掌握需要有专门的训练;作为孔门儒学最高理想仁学思想的表现方式和实现途径,礼本身体现出了强烈的理性色彩和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对礼的学习和掌握的专门训练躯体悟礼的内涵精神,可以不断炼造个人的品质,提高个人修养,使个人可以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奴隶宗法制社会,

收稿日期:2005-04-08

作者简介:安普华,天津滨海职业学院教师。

邮编:300450

达到社会对个人的要求,从而自立于社会。孔子不止一次的强调礼的这种功用,他说:“立于礼”(《泰伯》),“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以立”(《尧曰》),朱熹解释说:“礼以工经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励,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不知礼,则耳目无以加,手足无以措”。在此之上,孔子又指出礼怎样使人自立于社会,通过什么途径使人符合社会的要求,他说:“君子博学于文,为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雍也》)”,“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康有为解释说:“君子知欲无方,故于文物无不博;行欲有方,故其动必范礼,此则可以不肯于道矣”。也就是说个人在博学各种典章文化的基础上,用礼来统帅约束他的思想进行评判。他说:“恭而无礼,则戇;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康有为注:“功、慎、勇、直皆生质之美德,然德则空虚无薄,其施与人道之宜,尚有大过不及之患,必有礼以节制,然后可行”孔子认为功、慎、勇、直虽然是个人的美德,但是如果礼的制约,则会变成劳、戇、乱、绞四个弊端。另外,孔子认为好德如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刚等,只要不好学都会有所弊,唯有好礼,没有被列入有弊之内,这也可以看出孔子对礼在个人品德修养中的重要作用的重视。

其二,孔子认为礼具有调节人际关系的功能。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奴隶宗法制社会,宗法制度是由父系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到殷商时代已经初具规模到周代完全成熟,整个社会是以小家长制推而为大家长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家长制者,实行尊重秩序之道,自家庭始而推暨之以及于一切社会也。一家之中父为家长而兄弟姐妹以长幼之序别之。以是而推之于宗族,若乡党,以及国家。君为民之父,民为君之子,诸臣之间大小相维,犹兄弟也。因此整个社会的主要关系便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关系。礼则在此条件下调节人际关系,使之融洽和睦即达到《礼记·礼运》中所谓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它们在孔子的礼学思想中可以归纳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父子关系为基本关系,君臣关系为扩展关系,两者结合形成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

其三,孔子认为礼是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在孔子眼中,治国之礼一方面表现为一项基本的指导思想,渗透体现着孔子的仁的思想。他认为国君在治理国家时应用礼的态度,持有仁的思想宗旨,宽政爱民,以礼来感化人民,而礼的实行使人民易于治理。治国之礼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典章制度和等级纲纪体系。礼的外在表现是一系列包含仪式、服饰、器用等的安排以及左右周旋、进退俯仰的琐细而又严格的规定,体现着宗法等级思想。因此对礼的坚守就是对这一系列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对宗法制度的维护,使各个等级严守礼的规范,安分守己。在孔子的思想意识里,礼所规定的等级秩序是不可逾越的,否则就是非礼,表明怀有不臣之心是犯上作乱的表现,就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纵观孔子对等级制度的态度,无论是从个人从政的思想行为,国内的政治事件,还是国际间的关系和局势,他都始终不渝的坚守等级制度和准则,所以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

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对等级制度的坚守与否,已成为他评判政治清明与否的标准。

三、礼的伦理情感要求

在古代的原始仪典中,就有原始的人道主义与民主性因素,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原始的人道主义与民主性逐渐埋没于礼的繁文缛节之中。到了孔子时代,由于礼的繁复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而对奴隶等级体系的礼的冲击,人们在行传统的礼时只是流于形式。面对这种局面,孔子极力强调礼的实行应该含有真实情感,个人应该通过饱含感情的礼的行为去体悟礼所承载的深情大义,从而规范约束自我的思想行为。来达到维护国家的等级制度的稳定,维持日趋没落的奴隶制统治。在侍奉父母之礼上,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对于父母不只是赡养就是尽了孝礼,还要态度尊敬,常用愉悦的容色来对待父母才算称得上孝。他曾经就三年之丧礼和宰予讨论,他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他不但强调要守三年的丧期,还要把丧期与父子之间的亲子之爱联系起来,以此作为丧礼的情感基础,唤起人们对丧礼的哀伤之情,从而把这种外在的丧礼仪式转化为内在的伦理情感要求,使子女们通过三年期缅怀父母的养育大恩。相应的,孔子严厉批评“为礼不敬”并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阳货》)。认为实行礼如果不敬,没有了真实情感,那么就会使礼的内在精神消亡,而只变成“玉帛”之类的一堆死物,毫无意义。

四、“和”的实行原则

虽然孔子极力强调礼的伦理情感要求并把它视为礼的内在灵魂,但他同时也认识到了感情受外物引发和影响,而外物无穷,人欲无限,感情亦有可能泛滥,所以必须对感情加以节制,否则就会出现过犹不及的局面,破坏礼对人思想的规范作用。因此,孔子一方面批评临丧不哀,另一方面主张哀而不伤,认为悲哀应该有一个限度,不应伤害个体。子游则发展为“丧止乎哀而止”(《子张》),认为丧礼时只要能表达自己悲哀的情感就够了,而不应当失和,不应当损害生者。有若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进一步明确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学而》),这里有若提出了“和”的原则。认为“先王之道”之所以美,就在于通过它的功用,使社会达到了和谐统一。可以看出,孔子对礼的实行原则,强调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包含着对人的尊严和生命的肯定,他要求人正常合理地、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 [1] 郭昌林,中国礼文化[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2]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
- [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C],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3。
- [4] 康有为,康有为学术著作选——论语注[M],楼宇烈整理,中华书局,1984。
- [5] 吴贤哲,儒学与传统文化[M],巴蜀出版社,1999。
- [6]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商务印书社,2000。
- [7] 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58。